

第一辑

扮一回学术鬼脸儿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
龙鱼鼈生焉，货财殖焉。

——《中庸》

开会开到死

西方有句话耐人寻味：“既然无事可干，就开个会吧。”

会议者，人头辐辏，前来打团议事，或耳聆他人介绍情况，恭听上司耳提面命者也，形式看似庄重，功能自然不凡。开会之时，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更多者可达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大家如涓涓细流汇聚洼地或者汤汤支流齐来湖心，无论人多与少，会场聚些人气，或厚或薄。不过，开会也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会议多了，欲达到的会议效果却差了。

美国作家派屈克·蓝奇欧尼（Patrick Lencioni）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开会开到死》（*Death by Meeting*），胡馨如女士为其作序《你开的会也是大杂会吗？》，劈头便说：“开会开会，似乎每个人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每天忙进忙出地开各式各样的会。开的会愈多愈杂，好像表示身份愈尊贵，地位愈崇高。”对会议之多，大有怨言。不过，美国人很少开会，常常写便条（现在

也多用伊妹儿传递信息)，这本书并不是抨击会议之繁的，而是教人如何进行会议安排与交流管理经略的，而且以小说形式写出，读起来轻松愉悦。无论如何，那书名颇有些警示作用。

最近听一位司法官说：“我们一上班，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参加各种会议。”闻之颇有些触动。联想起看侦查破案的国产影视剧，里面常有开会的情景，大家汇总案件信息和破案线索，向在座的领导汇报，领得英明指示，继续明察暗访，直到案情真相大白；外国影视剧里（日本是一个例外）几乎见不到这种场景，原来不开会也能破案，这算不算一个启示？

将文化理解为无所不包，开会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不必要的会议太多，却是一种劣质文化的表现。我国素有开会的传统，虽中央下文制止文山会海，却总不见实效。如今会议成灾，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独司法机关如此，各个部门皆然，早已成为一种病态现象。

作家柏杨在讽刺小说《古国怪遇记》中抨击会议过繁现象，书中第十一回写的是“开会国”，说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等人组成“大唐帝国通天教朝圣团”，一路前往外国“朝圣”，行行重行行，不日来到一个国家，入得境内，待要倒换关文，“行至三岔路口，只见三个兵丁，蹲在道旁，交头接耳，唧唧咕

咕，叽叽喳喳”，即便有人上前问路，“也不答话，仍低头叽咕不停”，原来是在开会。好容易叽咕完了，一闻有人问路而且是问定了，便让对方在一旁稍候，再就问路问题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定夺。于是，“三个兵丁又蹲在一起，头碰头，膝碰膝，最初还小声争辩，后来大声吵闹，足足一炷香工夫”。然而仍然没有讨论完，一个提议转报上级处理，一个硬要推到下次会议详细研究，还有一个主张对问路者说了算了，相持不下。八戒性急，抓个兵丁问个究竟，见是这一结果，一松手，那兵丁跌个一脸泥灰，一溜烟儿跑了。过不多久，开会国大批人马杀到，兴师问“打我小军，冲散会议”之罪。双方开战，开会国兵马右元帅没个完从怀里掏出一个宝贝，是一叠字纸，在半空发出万丈彩光，耀眼欲眩，八戒难以招架，先被拿了。孙悟空迎战，也被一叠字纸打落尘埃。恰好张飞率七千人马前来相助，从怀里掏出更厚更大一叠字纸，破了对方的法术，原来开会国的宝贝是“分组讨论记录”和“专案小组记录”，不敌张飞怀里的“高层汇报记录”和“御前指示决定”。张飞毛手一挥，将开会国城池团团包围，城里出来一个打白旗的，禀告“敝国正在开御前会议，务请多宽限一个时辰”。结果，会议七天尚未开完，等张飞率军进入开会的柳林，发现早已僵尸遍地，每堆尸体旁边都有一个招

牌，有的写“临渴掘井委员会”，有的写“拔苗助长专案小组”，有的写“最高救亡联席紧急会议”……呜呼哀哉！

活在当下，哪里不是“开会国”？会议是逃不掉的，而且越是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会议越逃不掉。参加这种会议，常常痴想：何时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减少不必要的会议的事儿？不过，估计这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再空洞无聊的会，会议主办者都会大张铁口声震屋瓦，言明每个会都是百分之百绝对必要的。



会不在听，到场就行。
官不在大，带“长”就行。
日程排满，轮流撞钟。
有会凑一起，满屋老中青。
台上轮流讲，台下随意听。
领导真能扯，东西南北中。
专家更会整，美日德法英。
有人眯缝眼，有人发神经。
无气氛之热烈，有大脑之轻松。
谈笑有会友，往来无白丁。
会后几张纸，“综述”空对空。
孔子曰：“得隆得隆咚”。

鸡肋式研讨

学术研讨会，学术最不重要。

没有人，纯粹为了学术目的搞一次研讨会。搞研讨会，往往因为有一笔会议经费需要花掉。经费多，就搞得规模大些，来个豪华版；钱没花完，不行就再搞一回。有的研讨会，是国家机关与学术单位联手搞的，这种研讨会，与业绩挂钩。为了领导的成绩单有好看的一笔，就搞个研讨会，营造出“咸与改革”的气象。

学术研讨会，在哪里开很重要。主办方给报销往返交通费，免费提供食宿，外加旅游，功德就十分圆满。

研讨会上能见到哪些人，也很重要。大家多日不见，借此机会彼此握手言欢。年长者可以直观了解彼此还健在；初出道者拜见一下大咖，留个好印象，将来评职称和参评各种学术奖项，也好得个照应。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最受欢迎，有的人来套近乎，顺便打听一下自己投的那篇稿子能否被采用，也为以后发稿子蹚蹚路，做些铺垫。

没有人，纯粹为了学术目的参加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会，大多是为了捧场。大咖参加研讨会，算是给面子；有头有脸的官员参加研讨会，算是撑场子；初出道者参加研讨会，是为了增加露脸的机会，顺便替会议主办方凑个人气儿，履行“完形填空”的大任。

学术会议，研讨的话题令人敬畏，绝对是主题重大，叙事宏大。会议进行中，大家郑重其事，仿佛军国大事都是通过这类研讨会议决的。有限而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很多学者聚集，有泰斗焉，有漏斗焉。会议进行中，有顾盼自雄的，也有正襟危坐的；有不苟言笑的，也有表情丰富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与会者老是那些熟面孔。一次又一次会议参加下来，虽然不知研讨出来个啥，但是会议的形式还是很庄严的。猗欤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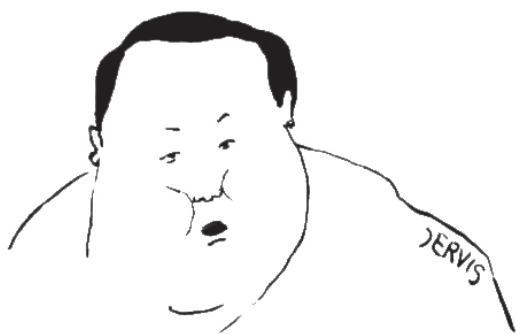
会议上发言，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发言。没人管你学术上有无创见，声望到了，自然有人安排你发言。不发言的，可以点评（如今学海峡对岸逐渐改叫“与谈”了）；既不发言也不点评的，就主持一下。发言、点评与主持，变成了一种资格、一种待遇。偶尔遇到自己提出什么都不想做、只来参会的大咖，主办方还觉得怪对不住人家。

到域外开会，就颇不适应。人家要求写出论文，并根据论文内容决定谁有发言的资格，郑重其事，很不利于心理健康。我们自己搞研讨会，脑子与耳朵都可以放家里，只带一张嘴来，发言时间一到，就按主持人安排说上一嘟噜话，时间过了，才会住嘴。吃会议饭的时候，这张嘴还有大用场。

会议印有日程，大家按议程行事，丝毫马虎不得。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除了议程表，还有座次表、拍照位置表，赶上有研讨会论文集的，更显得十分正式。

每人发言限定时间，会议还是以超时为常态。主持人强作幽默，实则俗套，会场时时有尬笑，掌声很廉价，代表着一种礼貌。

鲁迅曰：“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是谋财害命。”会议大厅坐一天，说与不说，听与不听，都挺累；坐两天，就更累。累了下来，发现不知道研讨了些啥，只觉得会议大厅更像个犯罪现场，被谋杀者间杂着自杀者（无端浪费自己时间的）横七竖八倒在血泊中。那时间，那卧姿，那血泊，谁都看不见。



有一朋友感慨：开会时，学术大咖们发言之后，很快溜之乎也。没多少学问的年轻学者，留下来侃侃而谈。

这话，我同意大半。另一半是，所谓“大咖”，也不一定都有学问。

泰斗与漏斗

学界人士，分为两类：一是泰斗，二是漏斗。

泰斗年纪不小了，属于年高德劭之辈。也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泰斗，积累了许多声誉，学问大得真如泰山北斗；一种是积累了许多年月，到了一定年龄顺势做了泰斗——人过古稀之年，就有坐顺风车成为泰斗的可能。倘若到了耄耋之年，不是泰斗也成为泰斗了——大家围拢在一起，人人喜欢用这称谓来捧他。给人的启示是，忝为学者，与其在学问上打拼，不如努力健康长寿，高龄才是泰斗的必要条件。因此，学者不用暗里起急，头发到了“浑欲不胜簪”的时候，泰斗的美誉就像陈桥兵变时黄袍加身一样，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未到古稀之年，着急上火也没用，那是不大容易成为公认或者御封的泰斗的。

泰斗之下，为准泰斗和候补泰斗。虽然尚未成为泰斗，其中自命的泰斗却满坑满谷，远比公认或者御封的要多。他们虽然没有泰斗的年龄，却有泰斗的气派，甚

至比泰斗更有气派。他们中有的人可以依外貌加以分辨：各种场合，他们眼神向上，眼睛恨不得长在眉毛上面，脸绷得像冰冻的湖泊，生怕一笑就将好不容易拢住的一点威信都泄掉，对晚辈不屑一顾，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这类自以为的泰斗，不惑以上年龄，未及古稀，写过一本至几本专著，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特别是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若干论文，对自己的学术水平相当认可，对他人的学问不屑一顾。

还有许多这类泰斗，仅凭外貌不易区分，可以从其他差异加以甄别。

漏斗是学界新人，在各种公共场合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没有自己的公众形象，面目模糊，没有多少学界声望，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充当分母。他们在会场里的成长轨迹是缓慢向前的：先是后面几排就座（学术研讨会开到当日下午和次日，前面出现空位时就被安排前去补位，起到“完形填空”作用），后来位置渐渐前移；通常在研讨会上没有法定发言机会，偶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再过几年，有了发言机会（如果是两天的会议，通常安排在次日发言，如果是一天的会议，必然是安排在下午发言）。

泰斗与漏斗有诸多区别，可以归纳如下：

只参加头一天上午的会议，午饭后就闪人不见了，

是泰斗；一直坚持把会场座椅坐穿，不到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绝不离场的，是漏斗。

有关会议的新闻报道，大名见诸报道之中的，是泰斗；“某某等”参加了会议，姓名被一个“等”字省略掉的，是漏斗。

会前问明自己发言的时间段，紧挨发言时间才到，发完言夹包就走，绝不与其他参会者进行学术交流，仿佛只是来给大家上课的，是泰斗；到会场看日程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发言机会，听别人发言，灌了一天糗糊，坚持在座的，是漏斗。

会议论文集，论文署名是第一作者的，是泰斗；论文署名在第一作者之后的，是漏斗。

无论发言超时多久，主持人都“不忍打断”的，是泰斗；因泰斗发言超时，其他人发言时间被压缩的，或者超时被厉声或柔声打断的，是漏斗。

会议开始前以及茶歇场合，有众人上前嘘寒问暖的，是泰斗；进来出去，无人闻问的，是漏斗。

颁奖场合，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的，是泰斗；获得二等奖以后奖项的，是漏斗。

参会与离会，有人安排车接车送的，是泰斗；自己爱怎么来就怎么来，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不来没人注意，走了也没人知道的，是漏斗。



有了一套泰斗与漏斗的区分标准，驰骋学术圈，一目了然，无往而不利。

羞于称学者

忝为学者，不能不参加学术会议。见得多了，忽然想到，学术会议本身就值得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好好研究一番。因此，请动笔墨，将一鳞半爪的观察与思考记录下来。

法律界的研讨会，既有学者，也有实务部门的与会者，著名学者往往是主角或者座上宾。

对于学者发言，不妨多一份期待。毕竟，学富五车，倾倒四座，高屋建瓴，一语中的，这一类美好词汇，都可用来形容学者的高谈妙论。学者之价值得以展现的场合，一是讲台，一是学术研讨会。深厚的知识土壤，能够长出妍丽的思想之花。笔耕的稼穡，舌吐的莲花，怎不令人期待？

初次涉足学术研讨会的雏儿，得瞻学者的丰神，无不满怀期待，希望学术研讨会是一场思想的盛筵。

多次与会，我留心观察，想领略学者比实务部门的与会者发言，有何高明之处。

观察的结果往往大失所望，学者的发言，大多未能展现学者的学术专长，其见识未见得比实务部门的与会者强多少。学者的角色，不具有无可替代性，有他与没有他与会，有他与没有他发言，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形式上的差别是有的，有学者充门面，壮声势，让很多学术研讨会带着学术气息，尤其是著名学者前来赏光捧场的学术研讨会。看与会者名单，已觉功德圆满，不必听他们玉音放送，便可以兴奋之情为会议点赞。

当学者轮流发言，准备了满满一胸怀的敬意也就慢慢消逝了。听其发言，大话套话者有之，陈词滥调者有之，信口开河者有之，思想贫乏、逻辑混沌、语言乏味者兼而有之，找不到打动人心的表达，更不见启发心智的思想。除了有发言的形式意义，并无表达的实际价值。洗耳恭听，谋杀的都是彼此的时间。

究其实，当今学者满坑满谷，虽然顶着学者的头衔，其实并无多少真实学问的大有人在。学术研究之创见，本应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如今之学术界，对于学术原创性并无严格要求。所谓学术研究成果，真正有知识增量的不多，自然就有许多无学之人混迹其中。即使有些学者对于个别学术问题有所心得，也不是一通百通，什么都懂，在各种研讨会上就各种问题

发言，自然力不从心。

学者缺少真实学问，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不重视新知识的获取，缺乏书卷气，这是当今许多学者的通病。学者本应为“书淫”，如今却读书量不足，殊不知学者主要知识来源是书籍，但许多人自断源头活水，不肯花时间读书，知识贫瘠，学问云乎哉！二是思想上懒惰，即使博览群书，凡事不去用功精研，便没有任何创见。转述别人的思想，并非学者价值所在，但是真要思想，又恐于精气神有损，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有些人，临睡稍一思想，就会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时胡思乱想，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没有艰苦探索，哪来的独到见解？三是缺乏学术研究的刺激源，学术研讨会上没有热闹的学术争议，更没有激烈的学术交锋，其乐融融，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心照不宣。学术圈充满混碗饭吃的家伙，学术研讨会上，大家相见会心微笑，都知道没有几个人在学术路上披荆斩棘，半斤八两，同侪尊重，谨遵缄默法则，不必说破。

当学者并不尊崇学问的时候，学术研讨会就成为学问的荒漠。叔本华曾言：“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知识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就是何以他们绝不可能写出传世佳作的原因。因为若要如此，他就必须把知识作为目的来追求。”论文、专著，只是评职称或者评奖的工具，达

到目的就好，谁管那里面有没有真实学问。

学者无学，言之必然无物。很多研讨会议题重复来重复去，大可将上次复上次的发言重述又重述，若轮到针对素乏研究的议题发言，自然就要扯淡。美国学者哈里·G. 法兰克福尖锐指出，当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话题侃侃而谈假装很懂的样子，扯淡就开始了。学术研讨会上偏多这种扯淡，好在大家都不计较，毕竟，会议的形式大于实质，认真做甚？

说到认真，这是解决各种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研讨会的不二法门。可惜，由于缺乏“认真”这一味药，学术研讨会的鸡肋化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一种坚韧不拔的现状，何足怪哉！



刘文典教授在西南联大时，闻沈从文被聘为副教授，勃然大怒，放言：“陈寅恪是个货真价实的教授，值四百元薪水一个月，我值四十元一个月，朱自清只值四元，沈从文四毛钱我都不给，如果他是副教授，那我呢？”

——倘若此老还在世，看到今日之衮衮诸教授，不知作何感想，定其价几文钱？

“博士生导师”是如何贬值的

不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豹子头林冲与鲁智深见面，递上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八十万禁军教头、博士生导师”。

那“博士生导师”五个字令人起敬起畏，鲁智深看到这一头衔，比看到“八十万禁军教头”还要敬服。围绕在鲁智深身边的几个泼皮，或许个个摩拳擦掌要考博士呢。他们热衷于拿个博士学位，至于求学的愿望，恐怕未必有。

博士生导师，作为一种荣耀的头衔，缀在“教授”的职称后面，成为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

考查一下“教授”后面缀以“博士生导师”的由来，可知那来头甚大：早年间确定博士生导师，要由国务院学位部门对申请者的资料进行审核，根据特定标准授予其资格，那时候能够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者，凤毛麟角，金贵得不得了。

如此荣耀，要是不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岂不如衣

锦夜行？于是，就有了中国学者有所会意而外国学者感到莫名的“博士生导师”头衔。

外国学者见识浅陋，哪晓得我们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博士生导师”成为一种头衔，往往一头雾水。这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博士生导师不是类似“教授”一样的“职称”，更不是凌驾于“教授”头衔之上的“荣耀”。在这些国家的大学里，指导博士生完成学业，帮助他们写出花团锦簇的博士论文，只是教授的一项工作，没啥了不起，哪值得如此夸耀？

近年来，受国外大学相关制度的影响，国内高校也有淡化博士生导师光环之举，例如清华大学领风气之先，在本校实行“教学—科研系列”^①岗位的评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都有资格招收、指导博士生。所谓“助理教授”，就是原来称的“讲师”，改称“助理教授”，比原来的“讲师”显得神气。这种副教授、助理教授都可以指导博士生的做法，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那就是将指导博士生还原为教师的一种工作职责，不再是曲高和寡的一类美妙资格。不过，近来听说校方有所反思，称这种改革并不成功，博士生导师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招生人数也多了上去，对指导质量产生了隐

① “教学—科研系列”是与“教学系列”“科研系列”并列的双能力岗位。

忧，学校又有了揽马回缰之想。

其实，即使不将“博士生导师”拉下神坛，“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也早就缩水。随着国务院特批导师资格的制度变为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高校自行评定和授予，不少学者一下子欢天喜地你也“博导”我也“博导”起来，很快博士生导师像水葫芦一样布满各个高等院校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池塘。

博士生导师多了，毕业的博士也就跟着像雨打的沙坑一般多了起来，博士满街走成了铁打不动的现实；但是，习惯使然，诸多教授还是没忘在自己的头衔后面缀上一个“博士生导师”或者简称的“博导”。

绝大多数博士生导师都是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教授、研究员，但在一些高校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博士生导师，他们是在国家机关任职，同时又有一些学术专长的官员，因而被一些高校隆重聘请为博士生导师。

能够受聘成为博士生导师的官员，人们目之为“学者型官员”。这些官员的优势是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也有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与发明创造，论培养博士生的能力，不比高校教授的水平差。

如果他们有志于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学术研究悉心传授给学生，花点时间与精力去好好培养几位学术后进，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身居高位的官员是否都有

足够精力和兴趣去悉心培养博士生，不无疑问。

一位任职司法界的高官翻身落马，在任时他的一些公开言论重新被抖出，其中一句“共指导了4名博士生即关门收徒，但现在学校仍然在以我的名义招生，由其他教授指导，我只是挂个名而已”颇刺人眼目。

原来，早在十年前某高校就聘他为“博士生导师”，但公务繁忙的他只“指导过4名博士生”，从此自己不再招徒培养，学校却以他的名义继续招生，招来的学生虽然挂在他的名下，实际上却是本校其他教授指导的。

这一情况，被他不经意地说出，起初并未引起瞩目，大概没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无须大惊小怪。如今这句坦白的話再次曝光，乃因他的隆重栽倒，忽然变得值得咀嚼一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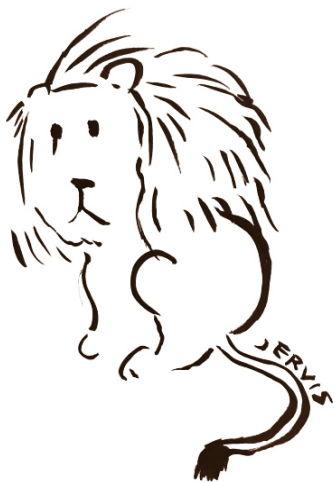
被高校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官员遽然落马，已经不止一个，这种事让一些高校的脸面有点不太中看；那些落马高官的“博士生”何去何从，也引起好事者的好奇。

按照过往的经验，既然事属个别，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云淡风轻，没有人会纠缠这类事，妄加议论。同样不会引起持久关注的是，那些号称博士生导师的官员是不是真的在指导博士生呢？

如这位落马官员所言，某些对外宣称在高校招生的

官员，只是挂名招生而已，培养学生之事由其他人代劳，这种操作，耐人寻味。这些官员本非高校专职教师，高校热衷于聘请他们做博士生导师，奥妙何在？难道只是为打造学校博士生导师的多元化，将实践经验引入博士生培养？这中间，有无利用他们作为自己权力资源之意图？那些公务繁忙难以拨冗的官员，既然没有精力亲力亲为地指导学生，为何高校不及时解聘这种名不副实的“博士生导师”，反而继续以他们的名义招生？明明属于弄虚作假，为何一些高校教师甘愿李代桃僵，只是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还是为了借别人的名额多为自己争取招生指标？

在权力面前，一些高校吃相难看，已为社会所诟病。它们不顾学术尊严，对权力极力巴结，烟视媚行，似乎已成痼疾，一时也难以改变。如今盖子既然揭开了，刹一刹这些高校的不良风气，矫正一下它们与权力结成的畸形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知教育主管部门何时能够彻查一下：到底还有多少“挂名招生”的情况存在？对于“挂名招生”的问题，是不是该认真清理一下了？



当大学老师都简称为“大师”，许多神圣的字眼也都不再有含金量，诸如教授、博士……通通如此。

学术评价的狐狸标准

寓言为儿童启蒙读物，成年人似乎不宜。成年人有足够理性，难以相信猫能言、狗能语。

叔本华曾言：有一次借了寓言书给一个男孩，那个男孩过了几天，嘟囔着把书还给他，对他说，书中动物皆能人语，与他的经验不一致，他不能相信书中所写。叔本华不禁叹道：德国人理性之发达如此可见一斑，连这样一个小男孩都理性十足，岂不令人刮目相看？少年儿童有的尚且如此，成年人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寓言稚气未脱，与成年人的成熟老练八字未合，人们在成年之后，很少再读寓言，无足为怪。

不过，寓言既有佳言隽语寓之其中，多有可观之处，闲来无事，翻翻寓言，成年人大可结合自己的阅历与生活体会，从寓言中取得共鸣，获得启发。

近日，偶然翻一本周作人先生翻译的《伊索寓言》，看到这样一则故事：

一头母狮子被狐狸责难，说她每胎只生一子，实在

太少。母狮子说：“虽然只是一个，但它是狮子啊！”

这则寓言，寓意是“价值不能以数目，但须看那德行”。

按其寓意，凡是重形式不重实质，重数量不重质量，大抵如狐狸的见识；反之，乃是狮子的评断标准。

以学术研究为例，如今对于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评价标准都是狐狸型人士制定的，引进人才也好，评职称也好，授予学术荣誉也好，都由有头有脸的衮衮诸公进行品鉴，品鉴过程只是计数论文发表的篇数，不管论文实际质量；除论文篇数之外，还有一项形式审查，就是看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发表在顶级期刊、权威期刊，那就是过硬的成果。这类成果多了，入职、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荣誉称号，种种好处纷至沓来，至于学术成果的实质内容怎样，没人在乎——大家都对学术期刊的用稿标准与质量深信不疑，认为发表在顶级期刊之类的论文总不会差。

固然，顶级期刊、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有着多年编辑经验积累，有着成熟编辑班底，不少编辑专业水平不俗，这类期刊有严格的用稿标准，发表的许多论文质量很高，久而久之，积累了学界的巨大声望。但是，毋庸讳言，即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业期刊，也不能保证每一篇论文都与顶级期刊、权威期刊地位匹配，从发表

在这类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中找出质量不高的论文并不难。这类论文，往往是作者名气大，编辑把关不严；或者可用的稿件一时凑不足，只能降格以求；还有的是因为编辑看走眼，分辨不出良莠，让平庸而精致的论文得到挤进版面的机会。

如今，许多学术期刊都引入匿名评审制度，请专业人士进行评审，以救济期刊编辑专业能力不足的缺陷，体现公正客观的审稿原则。这一做法，的确使学术论文的质量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有利于提高期刊采用稿件的质量。不过，理想与现实常常有差距，匿名评审制度也有它的缺陷——稿件落到不同人的手中，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审稿人会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取舍稿件，对于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稿子，仿佛孔子遇见少正卯，恨不得立即诛之以逞其快。还有的匿名评审专家，对于别人的稿子，如同后娘对待别人的孩子，总有不可名状的排拒心理，难以抑制将其毙掉的冲动。稿子落到这类人手中，算是走了霉运，即使不是咸鱼也难翻身。不仅如此，有的评审人顶着专家的光环，其水平也是武大郎在床底下打拳——出手不高，让他们评审稿子，建议采用的，也都与他们差不多同一水准；更有对于审稿没有责任心的专家，给出的匿名评审意见颇为随意。更令人不堪的是，虽曰匿名评审，评审人的信息可能早就春光外

泄，投稿人的请托电话打过来——他们得到的评审人信息又是期刊编辑泄露给投稿人的，这让评审人如何给得出客观公正的评审意见？种种情形下，期刊得以采纳的稿件，是否与期刊的品位与影响力一致，答案当然是“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各位看官问了：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水平，何不采取实质标准？让他提出几篇代表作，让评鉴者认真研读，提出适正的、实质性的结论，岂不大好？这种想法，诚属天真无邪。对学术质量，要进行实质评价，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合格的评鉴者，评鉴能力不足的人难以担当此任，如今的专家学者“专得过窄，学有不足”，不要说跨领域、跨专业，就是本领域、本专业许多问题都没有学术洞见和研究造诣，可是许多评审场合又恰恰是跨领域、跨专业成果横陈面前，叫人怎么进行实质性评鉴？二是投入很多精力，不但仔细读人家的研究成果，还要写出分析意见，这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许多学术成果评定的场合，根本没有预留那么多时间，要很快把成果等级认定下来，仅凭该成果发表的载体等级进行评定的办法就容易得多。三是认真的精神，在柏杨先生所说的“直八时代”，认真态度根本就是稀缺资源，认真的专家学者不是没有，凑上半打到一打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狮子的标准，意味着麻烦，也容易产生争议；狐狸的标准，省心省事，皆大欢喜。既然如此，狐狸标准大行其道，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反正学者专家对于哪些是狮子的成果，既无从分辨，也不关心，反而使学术界一片祥和。谁要是痴心妄想，试图去惊扰学者专家的内心宁静，必然不得人心。



林毓生先生主张：学术要“比慢”。又说：“比慢”不是“比懒”。

此说，在当下，似乎不合时宜。

王尔德曾说：如今是这样的时代，看得太多而没有时间欣赏，写得太多而没有时间思想。

为了多写多发，就来不及思想；没有思想，可以写得很多，发表更多。证明写作不需要思想，于是聪明的作者，更懒于思想。

法学的衣钵与法学者的使命^①

我国法学之繁盛，百年以来或曾有之，于今承平之日，民康物阜，人文日新，立言之才辈出，唯恨刊载嘉言宏论之刊物少也，岂嫌其多。《清华法学》遂婉出焉。

昔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子产以“吾以救世”报之，此一非一报，针锋相对，或为吾国法学之滥觞也。此后韩非、商鞅诸人，喜刑名之学，著书立说，倡言法治，法家遂兴。秦以法家之说兴国，灭六王，一统天下，然法家之说，司马谈谓之“刻薄寡恩”，以之为治，“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阿房一炬，雄朝瞬息兴灭，影响所及，法学让位于儒术，数千年来未尝翻身也。

梁任公云：“我国当春秋战国间，法理学之发达，臻于全盛，以欧洲十七世纪间之学说视我，其轩輊良未易言也。”然则春秋以降直至晚清之所谓法学，实为刑名

① 本文为《清华法学》发刊词，当初刊用时有删节。

法术之学；所谓法治，亦与源自英国之现代法治大异其趣，有橘枳之别。“吾国崇古念重，法治主义之学说，终为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门户之见，恶乎储胥，并其精粹之义而悉吐蔑之。而一切法律之事业，悉委诸刀笔之吏，学士大夫莫肯从事，此所以不能发达者一也。又法家言，主张团体自身利益过甚，遂至蔑视团员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而于助长社会发达，非可久适。其道不惬人心，虽靡旧说之反对，势故将敝。”商韩诸子之后，古时专治法学而卓然成家者，未见其人；晚清沈氏独步天下，开启后世法学之先河者，唯此公也。

我国民国时期之法制，取法欧陆日本兼酌英美，迅速成长，法学亦逞一时之盛，著作迭出，精良扎实者虽非恒河沙数，也大有可观。以著作论，《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律分册收书四千三百余种，尚有遗漏，此不过历三十八年之成就也，论文更不知凡几。然而1948年孙晓楼主编之《新法学》诞生时，杨兆龙先生撰文《〈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一文犹自痛诋法学内容陈腐、研究范围狭窄、法律技术机械、法律见解肤浅、适应及创造能力薄弱，深责“法学者之自满、保守及与一般社会生活之隔离疏远、忽视法律学理的研究、不讲法律制度的功能；法律教育之落后；社会上一般人之不重法与轻视法学专家”。今人临而思之，揽镜

自鉴，不可不自我激励与鞭策，奋起而有所致力焉。

法学者之使命，在促成法治之世，成保障自由之功，如希腊神话中阿尔克墨涅之女仆格兰西丝，以言破除生产女神厄勒提亚之束缚与咒语，使阿尔克墨涅摆脱苦痛，诞出婴孩，虽自己受变形而无悔焉。此婴孩者，民主、自由、法制与人权之谓也。

法学文章，大多求其经世致用，非风花雪月，吟物抒情者可比。顾炎武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方今之世，国家以“法治”相号召，法界同人，躬逢盛世，莫不自策骐骥，恐后争先。然而“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篇什虽多，创见却少；篇幅虽长，见解却浅。有鉴于此，本刊特以鼓励原创为宗旨，期待宇内贤士达人，不吝以有创见、有深度之佳构见赐。

吾清华以厚德载物立世，行胜于言，《清华法学》亦必以谨严求实自律，不以媚俗欺世邀宠。本刊虽学林新株，不敢后人，意将有所为焉。编辑部同仁在此敬告：吾刊不以源流、地域、亲疏划界自囿，必以开放之姿态，预留佳圃，鹄首以待，静候天下之医国手。



我国古代，只有律学，并无法学。古时幕客师爷多出自绍兴，绍兴之所教学，律学也，非法学也。

我国大学，分别培养法学博士、硕士、学士，同时培养法律硕士，如今又推行法律博士矣！法学学位为学术型学位，法律学位为专业型学位。以法学和法律分别名之，总觉别扭。窃以为兼妄以为，不如按法学和律学区分之，分为法学博士、硕士、学士，律学博士、硕士。不知此议何如哉？